

July 2024

Another Path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Lu Kanru and Feng Yuanjun's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i Cheng
chengwei80@126.com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Cheng, Wei. 2024. "Another Path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Lu Kanru and Feng Yuanjun's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4, (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4/iss2/16>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路展开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与民国文史研究转型

成 玮

摘要:陆侃如、冯沅君写作《中国诗史》，深受民国学术风气熏染。其书在文献考据层面，认夏代以前为不可知，全盘接受了胡适一派的疑古思潮。在诗史架构层面，则颇自出手眼：把“诗”的范围扩充至多数韵文，论证各时代主流体裁如何环环衍生，使得叙述更加系统化；以白话、文言迭相起伏贯穿全史，但不与体裁更替强行牵合，使得叙述更加弹性化。这两层面表现，均属新文化运动促成的文史研究转型之产物。前者当时已遭遇挑战，后者却代表着新文化立场介入文学史书写的另一方案，值得长久与之对话。

关键词: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新文化运动

作者简介:成玮，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晚清民国学术史研究。通信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200062。电子邮箱：chengwei80@126.com。本文系国家社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晚清民国古典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1FZWB05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nother Path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Lu Kanru and Feng Yuanjun's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Lu Kanru and Feng Yuanjun's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dopting a critical stance towards the veracity of ancient historical accounts, the authors aligned with Hu Shi's advocacies, presenting the pre-Xia dynasty era as an epoch veiled in obscurity. In terms of the structure of poetic history, it displayed great originality, for instance, b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poetry" to include the majority of rhymed prose. In addition, the book elaborated on how the mainstream genres of each era evolved in succession, making the narrative more systematic. Their narrative, adeptly woven with both 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Chinese, eschews conventional genre demarcations, introducing a versatility that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ve agenda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se approaches placed the book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in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prompted by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hile their critical skepticism faced contemporary scrutiny, the innovative structural underpinnings of their work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alternative discourse in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meriting sustained academic engagement.

Keywords: Lu Kanru; Feng Yuanjun;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New Culture Movement

Author: Cheng Wei, Ph. D.,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Tang and Song literature and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Addres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3663 North Zhongshan Road, Putuo District, Shanghai 200062, China. E-mail: chengwei80@126.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Post-Funding General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 (21FZWB055).

民国时期，中国诗歌通史著作层见迭出。^①其中最负盛名者，允推1931年陆侃如、冯沅君分三

卷推出的《中国诗史》，前两卷由陆氏撰写，末一卷由冯氏撰写。关于此书，学界不乏探讨。^②究其

学术渊源,则大都追溯到胡适身上。徐雁平分析胡氏白话文学史观如何作用于陆侃如^③,徐坤分析胡、陆二氏楚辞研究之离合(47—54),各有见地。然而,这部诗史初版所受胡适影响,非仅上述两点;它在此影响下的进一步开拓,也应获得更充分的揭示。本文就此作一综合考察。

一、诗史开端与诗体范围:在新风气吹拂下

写作《中国诗史》,有两个先决问题:一是从何时写起;二是“诗”的疆域,涵盖多少体裁。

先论前一问题。陆侃如所作“导论”指出:“《诗经》以前的‘古逸’,号为羲农尧舜禹汤时的作品,其实全系后人所假托,而一般文学史家却据以高谈什么‘邃古文学’!”(陆侃如 冯沅君,卷一 3)正文开篇《萌芽时代》,逐首揭发这些伪作的疑点,如《弹歌》《击壤歌》《卿云歌》《南风歌》《采薇歌》等,凡三十首,将它们一扫而空。但他又不满足于直从《诗经》叙起,于是另觅史料,目光投向甲骨卜辞。罗振玉、王国维“考定这些卜辞是盘庚至帝乙(纣父)时的遗物,证明了周以前渺茫的古史中还有较有把握的一个时期”^④,陆侃如由是暂定商代盘庚以降为中国诗的萌芽期。卜辞并非诗歌,只能借助人类等现代学科加以阐释,以拟想“当时社会的、文化的及艺术的一般状况”(陆侃如 冯沅君,卷一 29),从而推测诗歌已然萌生。至于具体作品,则无从得见。真正考论诗作,仍始于谈《诗经》。

《中国诗史》印行后,引来若干评论。这一截断众流的处理方法,为多数评家所认可。^⑤唯有王礼锡略表异议:“历举《诗经》以前的诗,为别的文学史所津津乐道的,一一辩明其不可靠,这是著者的卓识。不过要论及古代的文学,要根据‘可靠’的材料,是不会有。但在这许多较早出的伪书中,也许有不少可信的‘传说’,从传说的侧影,以窥见古代文学的略型,应当是可能的。”(2)他不否认伪书之伪,却不赞成一笔抹杀,仍希望从中发掘一二真实的历史遗痕。陆、王二人意见之别,正是新文化运动不同阶段结出的果实。

众所周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叙述,起于老子、孔子。在此之前,“从前第八世纪,到前第七世纪,这两百年的思潮,除了一部《诗经》别无可考”。他即主要依据《诗经》,略陈这“中国

哲学的怀胎时代”^⑥。西周中期往上,则概付于不可知。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追忆课堂听闻此番议论,“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挤而不能下”(顾颉刚,第一册 36)。嗣后顾氏悟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较胡适有所发展,可他对上古历史怀抱不可知的态度,此点实与后者一脉相承。数年过去,顾颉刚征引胡适更完善的一个说法,推崇它“可以做我们建设信史的骨干”(顾颉刚,第一册 99)。这说法是:周代尚有传世史料可征;更早的商代,则“我们应该向‘甲骨文字的系统的研究’里去寻史料”,考古发掘是唯一凭借。至于夏代以前,“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不得不俟诸异日(97、98)。顾氏持此态度甚力,直到抗战前夕依旧宣称:“试问唐虞是什么景况,实际上只有黑漆一团。”(吕思勉 童书业,第七册下编 101—102)

这种态度原极矜慎,及至20世纪30年代,却遭遇后起之士批评。1931年,陈槃读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未惬意之一便在于,“伪古史的产生,固然脱不了时代色彩和个人意向的好恶迁就,然而,这历史的暗示,史前史事的遗传,也是不可忽略的”(顾颉刚,第五册 660)。在陈氏看来,伪书内容虽不尽实,里面却存有上古的消息。研究者应致力于释读这些消息,不应如顾氏那般一概斥去。1933年,郑振铎也点名责备古史辨派:“我以为古书固不可尽信为真实,但也不可单凭直觉的理智,去抹杀古代的事实。古人或不至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末样的惯于作伪,惯于凭空捏造多多少少的故事出来。他们假使有什么附会,也必定有一个可以使他生出这种附会来的根据的。”(郑振铎 122)在郑氏看来,伪书中的虚构故事,自有其上古生成情境,足供推寻。古史辨派后劲杨宽撰《中国上古史导论》(1938年1月改定),同样循此路径前行。他写道:“夏以前之古史传说,其原形本出神话,经吾人若是之探讨,可无疑义。然吾人尚须由其原始神话而检讨其历史背景,以恢复其史料上原有之价值,然后古史学之能事尽也。”(吕思勉 童书业,下编 401)杨氏的工作分为两步:首先辨伪,论证关于三代以上传说,乃由原始神话分化而成。传说之不实,因是益发显明。其次伪中求真,进而解析那些神话,从中读取原始社会的真正情状。《导论》属于第一步,

杨宽计划续撰《中国古神话研究》，推进第二步工作。尽管后来其中辍，思路固历历分明。

置诸当时背景下，陆侃如与王礼锡之别，就透出学术史意义。《中国诗史》与王氏书评，皆问世于1931年，恰当伪中求真的新风尚发轫之际。陆侃如以《诗经》为传世最早的可信文献，商代则专据甲骨，更往前悉数不论不议，合乎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顾颉刚等人的立场。王礼锡要求从伪书中打捞真实的碎片，依稀复现原始诗歌的面貌，则与陈槃、郑振铎、杨宽等人所倡新风相投契，堪称史料观的一大推进。

次论后一问题。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叙及诗（含楚辞）、词、散曲三种体裁。陆氏交代理由：“我们的意思是想扩大‘诗’的领土。从前所谓‘诗’，是专指五七言的古今体而言。我们所谓诗，是指古往今来一切韵文而言。”（陆侃如 冯沅君 卷一 5）其基本分类标准，是形式上押韵与否。在这一前提下，复参照其他标准剔除少许，“至于有韵的散文（如赋赞箴诔）及有韵的戏剧（如杂剧传奇等）及有韵的小说（如佛曲弹词等），当然不在内”。（6）所谓“戏剧”乃就形式论，有宾白、科介、角色等，不只字面押韵而已。所谓“小说”乃就内容论，以叙事为中心。所谓“散文”，形式既与诗歌无大分别，则也是就内容论的。次一层级标准，陆侃如综合运用形式与内容两者，以为区分之资。

何以如是？浦江清有节剖析，可谓切中肯綮：“原来陆、冯两先生所用的这个‘诗’字，显然不是个中国字，而是西洋 Poetry 这一个字的对译。我们中国有‘诗’‘赋’‘词’‘曲’那些不同的玩意儿，而在西洋却囫圇地只有 Poetry 一个字。这个字实在很难译，说它是‘韵文’罢，说‘拜伦的韵文’‘雪莱的韵文’，似乎不甚顺口；而且西洋诗倒有一半是无韵的，……没有法子，只能用‘诗’或‘诗歌’去译它。无意识地，我们便扩大了‘诗’的概念。所以渗透了印度欧罗巴系思想的学者，就是讨论中国的文学，觉得非把‘诗’‘赋’‘词’‘曲’一起都打通了，不很舒服。”（浦江清 1—2）现代学者将“诗”的领地大幅扩展，乃至代以“韵文”之称，系经西方“poetry”概念这道中介转换。所得是嫁接出的新品种，既不同于传统“诗”的定义，也不同于西方“poetry”的定义。陆侃如无疑置身此一潮流之中。

所以比较而言，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和李维那类连词曲也弃置弗道的、狭义的《诗史》大相径庭^⑦，毋宁更近乎另几部以“韵文”为题的通史。这些韵文史又分两类：一类诗赋词曲无所不包。譬如前之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后之吴烈《中国韵文演变史》，均设专章论赋。^⑧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开卷便说，“中国文学中有韵的文字，大别为诗、赋、词、曲四类，这是一般中国文学者所公认的”（1），也是在韵文概念指引下，合四者于一编。从丘氏语看，那时节，这俨然已成共识。再一类为少数派，涵盖诗词曲而单撇开赋之一体。譬如陆侃如、冯沅君此书，以及稍后龙榆生的《中国韵文史》（1934年）。^⑨两书虽都不取赋体，考量却小异：前者如上所述，以内容为判准；后者则以形式为判准。龙氏“编辑凡例”谓：“本书以一种体制之初起与音乐发生密切关系者为主，故‘不歌而诵’之赋，与后来之骈文，概不述及。”（龙榆生 7）他扣住体裁起源有无音乐背景一点，把诗、词、散曲与赋划分为两个阵营。此外，龙榆生麾去剧曲，考量也在形式层面，“杂剧传奇，有唱有白，非全部乐歌”（7）。这与陆侃如较为一致。

在韵文内部复加取舍时，陆侃如或以内容、或以形式为准，灵活变化；龙榆生则一以形式为准。以明晰通贯言，后者显胜一筹。以合乎事实言，却是前者较优。因为“文类的区分不是对文章某一部分的区分，不仅仅是区分语言、形式、结构、内容、主题中的某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而是将文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区分”（姚爱斌 306），虽说这一来，难免遇到暧昧难辨处。两人之作，不妨各行其是。无论如何，陆氏对论域的厘定，趋新中又自出手眼，是显而易见的。

二、诗史分期与形式更替：白话传统的建构

进入具体论述，陆侃如、冯沅君所勾勒的诗史流变轨迹最值得关注。他们将中国诗分成三大时期：汉以前为古代，六朝（含建安年间）隋唐为中代，宋以后为近代，全书即依此剖为三册。古代诗特点“是自由——绝对的自由”，平仄、句度、篇幅、韵脚俱无定式，语言则“全系方言土语”。这一时期为“诗的自由史”（陆侃如 冯沅君，卷一 8）。中代诗“渐渐的趋向整齐划一，渐渐的发生

各种规律”，且“渐与语言脱离关系”，改用书面语。这一时期为“诗的束缚史”（8—9）。近代诗朝两个方向变化：“一个方向是拿乐律代诗律”，“还有一个方向是文字日渐解放”。这一时期为“诗的变化史”（9—10）。此中包含语言与体裁两方面形式要素，它们共同决定了诗史分期。在每一大时期内，《中国诗史》又各划出四个小时期，“每一小时期即以代表的诗人之名名之，如陶潜或苏轼；或以流行的体裁名之，如乐府或散曲”（10）。

此书大、小时期的界定，都曾遭受批评。关于小时期，论者指其以一人或一体笼括时代，失在以偏概全。^⑩唯独王礼锡别有所见，不反对如此做，而反对代表作家的选择。他主张：“各时代有代表各时代意识形态的作家，谁表现得最充分，谁就可被认为代表作家。”（王礼锡 本文5）这一层较易辩明。王礼锡作为“我国较早地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历史与现实的著名学者”（贾植芳 173—174），自然看重意识形态代表性。他的立足点，诚非陆侃如与冯沅君所能想见，尽管《中国诗史》偶尔也“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陆侃如 冯沅君，修订本“自序”1）。其他几家批评，归根结底只是正名问题。此书虽以一人或一体命名小时期，实际并不如此片面。譬如把三国称作“曹植时代”，但内部又分建安、黄初与正始、嘉平两段，曹植位于前一段，后一段则举阮籍、嵇康为代表（陆侃如 冯沅君，卷二 418—419）。把中晚唐称作“杜甫时代”，谓“他的诗在形式方面的特点是注重技巧，在内容方面的特点是注重民间疾苦……这两方面，便衍成韩愈及白居易两派”（751）。但在杜、韩、白三派之外，又特辟“其他诗人”一章，广涉刘长卿、韦应物、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十余家（842—867）。把北宋称作“苏轼时代”，但注意到“后于苏轼约廿年，词坛上又出了位重要的作者。这位作者便是周邦彦。……在十一世纪后期，他是可以与苏轼分庭抗礼的作家”（陆侃如 冯沅君，卷三 1030）。把南宋称作“姜夔时代”，但明知其时“承继北宋苏派的是辛弃疾诸人”，“承继北宋周派的是姜夔诸人”（1126、1129），分而治之。又如把两汉称作“乐府时代”，所谈限于乐府诗，但卷二叙三国部分，追溯五言诗起源，上及东汉文人诗，补足了汉

代诗歌另一块拼图（陆侃如 冯沅君，卷二 423—433）。纵观全书，每一小时期从未偏主一家或一体。所谓以偏概全，仅体现在目录上。待得1956年修订本，调整了各篇标题^⑪，问题遂就地消解。

关于大时期，论者指其以体裁更替划分时期，每种体裁盛期一过，便难以得到叙述，失在穷源而不能竟委。^⑫这一层则须稍加分梳。平心而论，陆侃如、冯沅君对此未尝无所补救。譬如以“乐府时代”专指两汉，而篇末缀《附论：南北朝乐府》一章，下探后世情形，即是例证（陆侃如 冯沅君，卷一 363—402）。可是当诗体盛期以后时段过长，如是处置，便嫌尾大不掉，故不得不割舍。宋以后（狭义的）诗付之阙如，元以后词付之阙如，皆为彰明较著的事实。今人即令推重其书，也无法讳言此点（张可礼 85）。不过换个角度看，这正是《中国诗史》与时代风气关涉最紧密处之一。

文学主流体裁与时更迭，其说肇端于元代，而以焦循、王国维之论最为人所习知。陆侃如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后，亲承王氏警欬；冯沅君则负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听过胡小石的课，后者祖焦氏之议论。陆、冯二人早已接触到此类观念（周勋初 30）。但是，焦循、王国维皆未将体裁更迭与文白消长相勾连。《中国诗史》这方面想法，显然出于白话文运动兴起以后。环顾当日，胡适与傅斯年同有类似思考。就次序言，胡氏发端在前，然而1926年与傅氏巴黎一晤，又深受后者启迪。^⑬兹先介绍傅斯年的见解。

1928年，他草撰《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在《楚辞余音》一节中说：

楚辞的起源当然上和四言，下和五言七言、词乃至散文的平话一个道理，最初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体，人民自造又自享用的。后来文人借了来，作为他自己创作的体裁，遂渐渐的变大规模，成大体制，也渐渐的失去民间艺文的自然，失去下层的凭借，可以不知不觉着由歌词变为就格的诗，由内情变为外论，由精灵的动荡变为节奏的敷陈，由语文变为文言。^⑭

每种体裁均有生命周期，从诞生、昌大到停滞，终

被其他体裁取代,譬如“楚调不衰,五言(诗)不盛”(傅斯年,第二卷 42)。周期流转之动力,主要在语言变化。上引“由语文变为文言”一句,吐露个中消息。语文指口头语,文言指经过文饰的口头语,两者有自然与人工之分,构成一大转关。《讲义》前面《语言和文字——所谓文言》一节,更加细密地分解出五项概念:方言、阶级语、标准语、文言、古文,循序演进(23—28)。前三项呈口头自然状态,名目悉数取自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史伟 155);后两项里,文言出自口语而踵事增华,已不尽自然,但仍与口头相连;古文则同口语彻底分途,“生命只在文书及金石刻上”(傅斯年,第二卷 27)。言文分途,即是体裁活力枯竭的主因。傅斯年评议白话与文言之优劣:“盖行文之白话正在滋长中,可由作者增其逻辑,变其语法,文言则不易耳。”(第二卷 536)这里“行文之白话”是由作者润色的口语,相当于《讲义》所说“文言”;较它僵化的“文言”相当于《讲义》所说“古文”。“古文”逻辑和语法的凝固,导致每种体裁终结。

傅斯年就读北京大学时,已然涉猎西方语言学(史伟 157)。1918年,其《文学革新申义》便提到:“诸子之中,自荀子等数家外,多用当时通行之语著之竹帛,即《论语》亦然也。”(傅斯年,第一卷 9)这里“通行之语”等于后来《讲义》所举,春秋战国间“为当时朝廷大夫士所通用,列国行人所共守”的标准语(第二卷 30),可知傅氏此一系列思想发源颇早。而下至1935年,他草拟试卷,题中还强调“中国诗辞之演进”,照例有起自民间,继为文人所用,渐趋丰繁工细,最终走入摹拟末路的一段历程(第五卷 66),论调久而弥坚。体裁和语言之互动,一向是傅斯年文学史研究的核心关切。

再介绍胡适的见解。开启白话文运动的《文学改良刍议》已发体裁进化之论(胡适,第二册 7)。据他晚年追忆,1916年酝酿阶段便具此念(第一册 279)。其后屡次提起,譬如尝为陆侃如节引的《谈新诗》(1919年)即称:“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⑤《诗经》、楚辞、五七言诗与词曲代兴,即是进化之路。但起初在胡适心里,体裁和语言犹判为二事。《文学改良刍议》列举八项倡议,

体裁演进系于第二项“不摹拟古人”下,白话运用系于第八项“不避俗语俗字”下,彼此不相统辖(第二册 7、13—14)。《谈新诗》有言:“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大解放;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器俄(按今译雨果)、英国华次活(按今译华兹华斯)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第二册 122)观其所给例证,体裁和语言并不处处同构。1918年,胡适作《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详解文学进化的四层意义,皆涉体裁而不涉语言,尤为显证(第二册 106—111)。

待到20世纪20年代前期,他讲授国语文学史,方把两者绾结为一。1924年《〈国语文学史〉大要》称:“白话的文学,完全是平民情感自然流露的描写,绝没有去模仿什么古人。”自《诗经》以至词曲,体式愈来愈自由,愈来愈宜于白话施展。而被取代的文体如楚辞,至汉朝“便成了古典文学”(第八册 123)。体裁和白话进退与共之势,在此宛然成形。唯一的欠缺是,过分排斥书面化。1926年,胡适在巴黎会晤傅斯年后,返伦敦作《〈词选〉自序》,表述又一变:

但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第四册 500)

其新变在于,开始顾及文人化、书面化的正面效应,即傅氏所说“弄得范围极大,技术极精”(傅斯年,第二卷 10)。以是年为界,胡适描绘的文学史图景也有差异。此前《国语文学史》谈汉魏六朝诗,纯以乐府民歌为言(胡适,第八册 23—33);此后改写为《白话文学史》,却大幅增加文士

作品,而且拈出阮籍,将其视作五言诗正式成立的标志,虽则阮氏“同时却也增加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第八册 171)。其间略可窥见傅斯年的痕迹。

细察胡适与傅斯年之见,也存在少许分歧。譬如前者说战国年代,“方言不同而当时文字上的交通甚繁甚密,可见文字与语言已不能不分开”。等到秦汉一统天下,“当时的方言既如此不统一,‘国语统一’自然是做不到的。故当时的政府只能用‘文言’来做全国交通的媒介”。^⑥胡氏把书面语(“文言”)直接在方言后面,傅斯年构造的口头语三级台阶——方言、阶级语、标准语,由此夷为平地。胡适甚至坦率否认“国语统一”,也就是标准语的存在。凡斯种种,消解了傅氏所依托的叶斯柏森假说。但是总体上,两人所同多于所异。他们都将文白消长的过程,放置到每一体裁内部去。

相较之下,陆侃如、冯沅君另是一路。他们注重文白消长,却不与个别体裁关合,而置于更长时段观之:先秦两汉主白话,六朝隋唐主文言,宋元明清复归白话,迭相起伏。两种路向各有千秋。照胡适、傅斯年的叙事,一种文体与白话渐行渐远之际,总有新文体接力承续白话的生命。这一来,白话在文学史上遂能运祚绵长,与文言“双线平行发展”(胡适,第一册 380)。胡氏相信:“用历史法则来提出文学革命这一命题,其潜力可能比我们所想像的更大。”(第一册 300)他们百世一贯的白话文学史观,就有力支撑了白话文运动。照陆侃如、冯沅君的叙事,有些体裁如五言诗的产生,便从白话视角下松脱出来。胡适与陆侃如都承认,五言诗源出民歌^⑦,这在今日已成定论(萧涤非 15—24)。然而五言诗既经文人提炼,乃脱离民歌母体而诞生,则其语言一开始便趋向书面化,是理所当然的。胡氏为了证明它初起时也用白话,特地划出汉末建安一段,以当“民众化”“通俗化”之目(胡适,第八册 169、170)。惜乎其时如曹丕、曹植兄弟,吟咏颇事华靡,实未能尽符所言。陆侃如不与白话牵合,论起初期五言诗来,反而相对自由,也更切合实际(陆侃如 冯沅君,卷二 415—418)。

《中国诗史》以宋元明清复主白话,下开现代新诗之局,同样显出白话文运动的锋芒。然而其书不求让白话贯穿全程,持论就稍多弹性。在此,

有必要点出学界未曾注意的一件事,即《中国诗史》卷一虽迟至 1931 年付梓,定稿却远早于此。兹列三证如次:

1927 年初,陆侃如发表《〈古代诗史〉自序》,宣布“上卷已脱稿,共五篇,十七章,七十三节”,与初版篇数、章数分毫不差,这表明 1926 年已有成稿。^⑧此其一。1930 年,陆氏自陈关于屈原作品真伪,看法几经变动,“第一次在《屈原评传》(亚东本《屈原》卷首)里,相信他有十一篇,即《离骚》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是。第二次作《楚辞》(商务本)的《引论》,便在《九章》中除去《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四篇,共剩七篇。第三次在《中国诗史》(第四篇第三章)里,又减去《天问》与《九章》中的《橘颂》二篇,所以他的作品只有五篇”(陆侃如,《屈原与宋玉》24—25)。反观《中国诗史》初版,则说,“我们认为只有《离骚》《天问》及《九章》之半(即《橘颂》《抽思》《哀郢》《涉江》及《怀沙》)是真的”(陆侃如 冯沅君,卷一 222),仍循第二阶段《〈楚辞〉引论》(1924 年作)之说,认《天问》与《橘颂》为真。这表明初版所用,甚至并非当时最新一稿。此其二。1927 年,陆侃如称:“二《南》为何能在三百篇中取得最高的位置?其原因非一,最重要的有二:一是他产生的地点,一是他所凭藉的音乐。”(《二南研究》273)而《中国诗史》初版仅说:“为何二《南》在三百篇中占有特殊地位而常为人所称道?我们以为这是因它所凭藉的音乐与《风》《雅》《颂》不同之故。”(陆侃如 冯沅君,卷一 173)单言音乐,不言地域,思虑未及 1927 年一文周详。这更确凿表明,初版所用即 1926 年成稿。此其三。

1924 年,陆侃如两度致信胡适,畅谈《中国诗史》分期标准(杜春和等 699—700、700—704)。其时他但论体裁,不论语言,文言白话迭相起伏的思路,尚未清晰浮现。可见这一思路,生成于 1924—1926 年。胡适与傅斯年的文学史观,此际也在形成之中。陆侃如最初虽受胡适启发,但很快铺展出一套不同的诗史架构。这使得《中国诗史》别具认识意义。

三、诗史衔接与文献考证:进化链条的延伸

《中国诗史》所勾勒的历时流变轨迹既明,接着一探其细部论述。陆侃如总结自身早年研究:

“我那时的论著大都是资料性的,考据性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583)此书也不例外。刊行未几,其考据功夫便引人瞩目。^①然而即在考据之中,也反映出若干诗史观念。譬如书中断定“《九歌》在屈平以前,是不成问题的”(陆侃如冯沅君,卷一 198),彻底剥夺屈原对它的著作权,这一例就颇能说明问题。

1949年以后,陆氏态度略见和缓,承认今传《九歌》或许曾由屈原润色,不过坚持其“成就应主要归功于民间的无名诗人”^②,依然低估屈原的作用,实质并未让步多少。他把《九歌》年代提到屈原之前的意图,彰彰明甚。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观点却非起始即有,它经历了几度演化。

最先质疑《九歌》署名者乃是胡适。1922年,其《读〈楚辞〉》一文指出,“《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胡适,第三册 69),并以屈原接踵其后。此文全就《九歌》内容立言,胡氏取示陆侃如,后者因撰《读〈读楚辞〉》与之商榷。这篇商榷文字表示:“第二段里他(按指胡适)定《大招》《远游》为后人伪托,是与我不约而同的。所不同者便是关于《九歌》《天问》《卜居》《渔父》等十四篇的著者及时代上。”(《读〈读楚辞〉》第1版)此时,陆氏还不相信《九歌》非屈原作品,与后来见解迥殊。

翌年,陆氏发表《屈原生年考证》,改从胡适之说。文中记录后者私下谈话,另外举出“两条很重要的理由”:首先,“若《九歌》也是屈原作的,则楚辞的来源便找不出”;其次,“《九歌》显然是离骚的前驱,我们与其把这种进化归于屈原一人;宁可归于楚辞本身”(《屈原生年考证》第1版),两条均就诗体进化次序立言。胡适着眼于作品内容,无法说服陆侃如,转而谈此则如响斯应,不难窥知陆氏兴趣所在。两人不同处是,前者但以《九歌》拥彗先驱;后者更进一步,努力构造连续的发展链条。陆侃如检出十二首约当前6世纪的楚语古诗,置于《九歌》前面;且一度以为宋玉年长屈原四十年上下,置其《九辩》于《九歌》后、《离骚》前。于是“《离骚》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找到了,而楚辞进化史便完全明白了”(《屈原生年考证》第1版)。同年稍后,他迅速放弃了宋玉长于屈原说,但又检出《说苑·正谏》载“薪乎菜乎”一首、《史记·滑稽列传》载优孟歌等,置于更早

的前7世纪,仍然维持着《离骚》前史的三个阶段。^③

胡适、陆侃如重定《九歌》时代,至此始终流连在说理层次,毫无实据。游国恩即针砭道:“他们这话虽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终乎苦于拿不出证据来,故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游国恩 90)如何证定此说,成了一项紧迫考验。要系《九歌》于前6世纪楚歌后、屈原(按陆氏定其生年为前343年)前,上下限皆有要求。1924年,陆侃如先在上限方面获得突破。他寻出《左传》哀公六年楚昭王弗祭河神一事,因《九歌》有《河伯》篇,知其“最早不得在西历前四八九年(按指楚昭王卒年)以前”^④,由此将《九歌》定在前5世纪后。^⑤至于下限,犹需他人成果助力。1926年,游国恩提示其中《国殇》一篇描写车战场景,“考车战之法到战国时已经不用,可见《九歌》必是战国以前——春秋——的产品”(游国恩 95)。这条论据相当有力,惜乎游氏未给出书证。同年底,陈钟凡《楚辞各篇作者考》也援此事为证。他引用《礼记·曲礼》孔颖达疏等三则文献,更加信而有征(587)。《中国诗史》初版即取其说,把这三则书证尽数纳入囊中,且著陈氏姓名(陆侃如冯沅君,卷一 196),由此将《九歌》下限也定在前5世纪内。

当《九歌》作时上限确立、下限未明之际,陆侃如又向前延伸发展链条,连通《诗经》的《周南》《召南》。1925年他致信胡适说:“我想把现在《诗经》的次序翻过来。……我们试看《颂》之晚出者体裁便近《雅》,《雅》之晚出者体裁便近《风》,而《风》之早出者则体裁近《雅》,便可知其先后相因之迹了(晚出的《南》,实在是《诗经》与《楚辞》的媒介)。这一点非三两语可尽,好在不久还有当面请教的机会咧。”(《寄胡适之书》60)味其辞气,彼时陆氏只蓄之胸中,尚未落为文字,稍后方始作了系统论证。^⑥

自二《南》经前7世纪楚歌、前6世纪楚歌、前5世纪《九歌》而至屈原的体裁嬗变,总体呈现于《中国诗史》初版卷一(陆侃如冯沅君,卷一 160—75、189—210)。从上述几度演化足以察觉,陆侃如这一系列论点,乃是理念先行,其后再渐次加固文献支持,本质上非考证之功。这理念便是,每种体裁由起源到成熟,必走过一段漫长的进化过程。论者尝谓“陆侃如楚辞学研究的方法实来

自胡适‘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徐坤 53),固然不错,然而陆氏自有其特色。他寻绎的诗史进化线索,长度与层次都远迈胡氏。更重要的是,他发明了一些诗体间的衍生关系。统观整部《中国诗史》,冯沅君所著卷三,论述词与散曲,斩截地同之前诗体划开界限。^⑤陆侃如所著前两卷则不然,论述《诗经》、楚辞、乐府、五七言古诗与近体,处处打通。称古诗源出乐府,近体源出古诗,还可说水到渠成;称楚辞源出《诗经》,乐府源出楚辞,却非寻常意计所能及。他怎样证成《诗经》向楚辞的移步换形,具见上文。再看乐府。陆侃如以刘邦《大风歌》充任“汉乐府的开端”(陆侃如 冯沅君,卷一 286)。史载“(汉)高祖乐楚声”,此作即袭楚歌体式,乐府借此就上连楚辞了。与论《九歌》相似,他这一观点也有一演化过程。1925年,陆氏写成《乐府古辞考》,还是从汉武帝设乐府叙起^⑥,乐府与楚辞的联系尚未形成。《中国诗史》进而前溯,及于刘邦、楚辞,铺设长线链条的意图,同样彰明较著。在胡适笔下,进化意味着体裁新旧更替;在陆侃如笔下,体裁不唯新旧更替,抑且新出于旧,环环衍生,诗史的连贯性因而大幅增强。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的学术特色,多属新文化运动促成的文史研究转型之产物。其间又分两层:一是文献考据。尽管颇著新见,但其基本立场,是全盘接受胡适一派的疑古思潮。诚如陆氏本人所言:“当知疑古是我们的主张,考证是我们的方法。”(陆侃如,“序”;游国恩 5)这一立场在其书刊行之初,已然遭到挑战。二是诗史架构。虽也倒映出胡适的影子,却有长足拓展,故而最应珍视。扩容“诗”的概念范围,加强诗史内部连贯性,使得叙述更系统化。推举白话而不以之贯穿首尾,使得叙述更弹性化。倘使将胡适、傅斯年标举的白话史观,看作新文化运动介入文学史书写的主流方案,^⑦那么陆侃如、冯沅君这部著作,则代表着另一处理方案,观点未必足成定论,然而值得长久与之对话。

注释[Notes]

① 参见刘扬忠:《中国诗史研究与撰著的世纪回顾》,《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02):336—342。这里“诗歌”概念取广义,包括多种韵文体裁。

② 张可礼:《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中国诗史〉的主要贡献》,《文史哲》2(2002):80—85。此文论述较全。

③ 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215—233。

④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卷一),上海:大江书铺,1931年,28。参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卷九),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283。

⑤ 泽:《〈中国诗史〉》,《书报评论》5(1931):82—83;殷齐德:《〈中国诗史〉》,《学风》7、8(1936):“书报评介”栏4—5。

⑥ 胡适:《胡适文集》(第六册),欧阳哲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70、166。此种立场,胡适《先秦名学史》已开其端,参见胡适:《胡适文集》(第六册),3。

⑦ 李维《诗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159—163)继刘毓盘《词史》而作,讨论对象互不相犯。其书卷中第十三章题为《五代小词代诗》,而所述依然是狭义的五七言诗,不含词作。曲更不在其眼中。

⑧ 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76—88。吴烈:《中国韵文演变史》,上海:世界书局,1940年,23—31。

⑨ 更早则胡怀琛论中国诗,以诗词散曲为主体,以剧曲与讲唱文学为“诗歌的旁枝”附及之,不涉赋体,略近于陆侃如、冯沅君和龙榆生的取径。胡怀琛:《诗歌学ABC》,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23—66。

⑩ 浦江清:《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新月》4(1932):“书报春秋”栏7—8。春痕:《〈中国诗史〉书后》,《女青年月刊》3(1933):68。殷齐德:《〈中国诗史〉》,《学风》7、8(1936):“书报评介”栏4—5。

⑪ 譬如“曹植时代”改称“三国诗”,“李白时代”改称“初盛唐诗”,“苏轼时代”改称“北宋词”,“姜夔时代”改称“南宋词”,“散曲时代”改称“散曲及其他”,等等(陆侃如 冯沅君,修订本 257、403、613、667、715)。

⑫ 浦江清:《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新月》4(1932):“书报春秋”栏6—7。春痕:《〈中国诗史〉书后》,《女青年月刊》3(1933):67—68。李嘉言、沈达材:《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图书评论》12(1933):61、68—69。

⑬ 参见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363—364。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01—202。

⑭ 傅斯年:《傅斯年文集》(第二卷),欧阳哲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92—93。参见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叙语》,《傅斯年文集》(第二卷),10—11。

⑮ 胡适:《胡适文集》(第二册),124。陆侃如的节引,见

陆侃如 冯沅君:《中国诗史》(卷三),1422—1423。

①⑥ 胡适:《国语文学史》,《胡适文集》(第八册),17、18。《白话文学史》承袭其说,见胡适:《胡适文集》(第八册),141、142。

①⑦ 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第八册),163。陆侃如 冯沅君:《中国诗史》(卷二),420。

①⑧ 陆侃如:《〈古代诗史〉自序》,《国学月报》1(1927):49。陆侃如 冯沅君:《中国诗史》初版卷一,导论不分节,正文四篇十六章,共五十五节。《自序》文中七十三节之数疑误。

①⑨ 穷书生:《读〈中国诗史〉》,《中国新书月报》8(1931):21—22。浦江清:《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新月》4(1932):8。殷齐德:《〈中国诗史〉》,《学风》7、8(1936):“书报评介”栏4—5。

②⑩ 陆侃如 高亨 黄孝纾选注:《楚辞选》,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参见陆侃如:《〈古代诗史〉修改表》(手稿),陆侃如 冯沅君:《〈中国诗史〉手稿》。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657。陆侃如 冯沅君:《中国诗史》(修订本),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106。

②⑪ 陆侃如:《屈原评传》,《屈原》,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110—113。数年后,冯沅君发表楚辞论文,所言与之有别,而陆侃如仍主前说。可证《离骚》前史三阶段说,系陆氏独立得出。冯沅君:《楚辞之祖祢与后裔》,《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2(1926):156—164。

②⑫ 陆侃如:《〈楚辞〉引论》,《国立暨南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期刊》1(1928):33。此文登出较晚,不过文前小序声明作于1924年,“其中所说只能代表那时的我的见解”。

②⑬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勋初更翔实地证明,河伯乃北方地祇,非楚人祭祀对象。不过他推想,屈原可能通过奉使、阅读或欣赏北方祭祀演变出的歌舞等途径,接触到北方神祇,故《九歌》传统署名仍然成立。周勋初:《九歌新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4—86、139—150。

②⑭ 陆侃如 冯沅君:《中国诗史》(卷一),58—175。陆侃如:《二南研究》,《国学论丛》1(1927):271—278。

②⑮ 冯沅君说:“我们认为探讨词的起源的人们,应该从唐代的音乐和诗上着手,至于那些词出于《诗经》、乐府、杂言诗等说法,都是一钱不值的谬论。”所谓同唐诗的关系,仅指近体曾经入乐演唱,无奈“律绝这种诗体和当时风行的外族音乐,实各有其来源与性质”,难免凿枘,故终于被词取代。唐诗也非词的前身,后者自成一崭新体裁。陆侃如 冯沅君:《中国诗史》(卷三),890、888。

②⑯ 陆侃如:《乐府古辞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1。此书“序例”未署“(民国)十四年四月”。

②⑰ 关于胡适此说风行程度,姑举一例。1921年,他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教授“国语文学史”,编有石印讲义。短短一二年后,毕业于此届讲习所的凌独见便写出《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刊行,列

为中等学校用书。彼时胡氏讲义尚无修润,更未正式出版,而观点经由学生转述,进入教育系统,早已流布开来。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钟凡:《楚辞各篇作者考》,《图书馆学季刊》4(1926):34—51。

[Chen, Zhongfan. “A Study of the Authors of Each Chapter of *The Songs of Chu*.” *Library Science Quarterly* 4 (1926): 34 - 51.]

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Du, Chunhe, et al., eds. *Selected Academic Correspondence of Hu Shi*.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Gu, Jiegang, ed. *Doubting Ancient History*.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2.]

——:《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Gu, Jiegang, ed. *Doubting Ancient History*. Vol. 5.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2.]

吕思勉 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Lü, Simian, and Tong Shuye, eds. *Doubting Ancient History*. Vol. 7.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2.]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四)。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

[Jia, Zhifang. *Complete Works of Jia Zhifang*. Vol. 4. Taiyuan: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20.]

龙榆生:《中国韵文史》(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Long, Yu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Verse (and Two Other Works)*.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7.]

陆侃如:《寄胡适之书》,《国学月报汇刊》1(1928):58—60。

[Lu, Kanru. “Letter to Hu Shi.” *National Learning Monthly Review Collection* 1(1928): 58 - 60.]

——:《屈原与宋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 *Qu Yuan and Song Yu*.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0.]

——:《读〈读楚辞〉》,《读书杂志》1922年12月3日第

- 1—2版。
- [---. "Reading 'Reading *The Songs of Chu*'." *Reading Magazine* 3 December 1922.]
- :《屈原生年考证》,《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3年3月21日第1版。
- [---. "Research on Qu Yuan's Birth Year." *New Paper of Current Affairs · Ten-Day Literature Periodical* 21 March 1923.]
- :《二南研究》,《国学论丛》1(1927):271—278。
- [---. "Study on the 'Two Nans'." *National Studies Colloquium* 1(1927):271—278.]
- 陆侃如 冯沅君:《中国诗史》。上海:大江书铺,1931年。
- [Lu, Kanru, and Feng Yuanjun.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Shanghai: Dajiang Bookstore, 1931.]
- :《中国诗史》(修订本)。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
- [---.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56.]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Academic Degrees Committee, ed. *Self-Narratives of Chinese Social Scientists*.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7.]
- 傅斯年:《傅斯年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 [Fu, Sinian. *Collected Works of Fu Sinian*. Ed. Ouyang Zhesh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8.]
- 胡适:《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 [Hu, Shi. *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 Ed. Ouyang Zheshe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 浦江清:《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新月》4(1932):“书报春秋”栏1—8。
- [Pu, Jiangqing.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by Lu Kanru and Feng Yuanjun." *The Crescent* 4(1932): "Book and Newspaper Chronicles" Column 1—8.]
- 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 [Qiu, Qionsun. *An Overview of Poetry, Fu, Ci, and Qu*.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34.]
- 史伟:《西学东渐中的观念、方法与民国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以语言学的输入为中心》,《文学评论》1(2021):153—160。
- [Shi, Wei. "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Concepts, Method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Center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Linguistics." *Literary Review* 1(2021):153—160.]
- 王礼锡:《〈中国诗史〉》,《读书杂志》6(1931):1—5。
- [Wang, Lixi.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Reading Magazine* 6(1931):1—5.]
-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 [Xiao, Difei. *The History of Yuefu Literature in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1.]
- 徐坤:《当仁不让于师:“楚辞之争”与陆侃如对胡适的驳辩》,《齐鲁学刊》2(2017):47—54。
- [Xu, Kun. "Unyielding to Teachers: 'The Debate over *The Songs of Chu*' and Lu Kanru's Refutation of Hu Shi." *Qilu Journal* 2(2017):47—54.]
- 姚爱斌:《中国古代文体观念与文章分类思想的关系——兼与西方文类思想比较》,《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3(2007):304—310。
- [Yao, Aib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pts of Ancient Chinese Genre and Thoughts of Article Classification and a Comparison with Western Genre Idea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3(2007):304—310.]
- 游国恩:《楚辞概论》。北京:述学社,1926年。
- [You, Guoen. *An Overview of The Songs of Chu*. Beijing: Shu Xue Society, 1926.]
- 张可礼:《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中国诗史〉的主要贡献》,《文史哲》2(2002):80—85。
- [Zhang, Keli. "The Major Contributions of Mr. Lu Kanru and Mr. Feng Yuanjun's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2002):80—85.]
- 郑振铎:《汤祷篇——〈古史新辨〉之一》,《东方杂志》1(1933):122—137。
- [Zheng, Zhenduo. "Prayer of Tang — 'New Critiques of Ancient History'." *Oriental Miscellany* 1(1933):122—137.]
- 周勋初:《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文学遗产》1(2000):21—32。
- [Zhou, Xunchu. "Th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Meaning of 'Each Generation Surpasses the Previous One' in Literature." *Literary Heritage* 1(2000):21—32.]

(责任编辑:查正贤)